

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将是公民的、尽责的、协力的，或者不是

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之上

它的建立需要一个网络的变革战略

作者：皮埃尔·卡蓝默

译者：陈力川

概要：

2003年，巴西政府表达了对大学进行深入改革的愿望。为此，巴西教育部部长于2003年11月在巴西利亚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本文是皮埃尔·卡蓝默在这次研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解释了为什么大学和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契约之后，作者以《人类责任宪章》对责任的诠释为依托，描述了这个新契约的基本轮廓，从而引伸出这个责任应当建立在四个层级上的结论：大学教师，大学，国家，世界大学教师共同体。

这个责任分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未来的精英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二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但是仅仅有明确的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一个长远的、多层级的变革战略，并建立“改革支持者”的联盟。

关键词：伦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干部培训，变革战略，社会契约，社会责任

地区关键词：巴西，世界

参号：intranetfph/bip/2311, AVE218 - Enseignants/Universitaires

1. 大学改革：回应二十一世纪挑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03年1月，在《高等教育宣言》发表五周年之际，我曾指出在该宣言中被严重低估的因素：

1-1. 大学既是导致目前世界危机的原因之一，也可提供化解危机的办法。

- 彻底变革和建立大学与社会新契约的必要性；
- 对大学责任主要特点的思考；
- 制定网络变革战略的需要。

我在那次演讲中勾勒了这个战略的轮廓。今天我希望重新阐述并深化我的那些想法。

与在座的许多人不同，我不属于大学。而且，我也不认为大学能够仅仅按照它自身的发展逻辑从内部实行变革。大学是社会的产物，它应该按照新的社会要求去变革，我将尝试从这些新的要求出发来论述大学深入变革的必要性和条件。

我在这样做的同时，将扩大思考的范围，不把大学看作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社会机构，而是将它看作一个实践更广泛思考的特殊机构，这种思考经过必要的修正也适用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团体。

我的思考基于我个人的三种经历，它们构成了“我讲话的出发点”。

- 我过去担任法国国家高级官员的经历使我深入思考公共行为的历史根源，思考目前危机的原因和改革遇到的困难以及治理革命的原则。这使我得以了解制度机器的强力，它们总是凌驾于我们为之确定的目标之上；

- 我领导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的工作快二十年了，出于我将阐述的理由，基金会把促进世界共同体的产生作为工作重心。我深知通过工作网络和严谨的方法集体共建未来的重要性，这个未来的前景植根于具体的行动之中。

- 最后，作为一个国际行动的发起人（“尽责、多元和协力的世界的联盟”，“大学改革国际观察所”就来自这个联盟），我得以发现当今世界危机的共同根源和由此产生的首要任务。这就是我们在世界公民大会以后制定的“二十一世纪日程”。

现在的大学既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也可以提供化解危机的办法。

1-2. 学习处理各种关系的紧迫性

当今世界的危机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主导机制外，还有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危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危机，可以举社会排斥的例子；社会之间的危机表现为在目前政治调节的框架中很难处理我们的相互依赖关系；最后是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危机，因为社会消耗资源的速度远比资源再生的速度快，而且这种情况还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这种处理关系的难题随处可见，好像笛卡尔主义用分解帮助理解的模式退化为精神分裂症和普遍的隔离。

- 在工业生产领域是各种产业部门的并置；
- 在大学中是知识的分割；
- 在公共行为中是各部门政策的并列；
- 在社会中是朝“管风琴”体制的演变，在这个体制中，同一个领域的人即使处在地球的两端，也比邻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 在农业中是缺乏对生态系统总体思考的能力。……

应当将这种关系危机跟西方的发展模式危机联系在一起，其特点是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

当有人对你说：“科学不可阻挡”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因为这等于说科学是命运的代名词！当我们在伦理层面辩论克隆人或基因改造这样严肃的问题时，有人不苟言笑地解释说：“想要阻止实验室的研究和发明专利的愿望是不可能的。”市场的情形也是一样。将市场经济作为自然法则来推广是十分荒谬的。这既经不起历史的分析，也经不住政治的考量。

但是大学却那些把不合目的性的做法（科学、法律、管理、经济）越来越多地灌输给学生，为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倒置推波助澜。

1-3. 不要再用昨天的观念和前天的制度去管理明天的世界

目前思想混乱的一个明证是世界化（mondialisation）和全球化（globalisation）在语义上的混淆。英语中只有一个词，就是“全球化”。从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到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减少关税壁垒的谈判，再到跨国公司的投资自由，一切都被“全球化”。幸运的是我们在法语中有两个词：我借以区分世界化和经济全球化。

何谓世界化？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可抗拒的既定事实：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逐年增加，直到真的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八十年代，著名的臭氧层空洞问题之所以受到媒体极大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能导致皮肤癌的严重后果，更多的是因为它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与工业国家的活动有关。它表明工业活动对宏观气候和大气层的影响可以发生在没有工业的地方。自从有了卫星照片和蓝色地球的画面，一系列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描绘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我们大家共处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很脆弱，而且受到威胁。这种同舟共济的意识就是世界化传达的信息。人们意识到温室效应是从开车而不是骑自行车去买面包到水稻种植的发展等无数因素的总和，意识到这一切都反映在大气层上，酸雨可以移动，契尔诺比（Tchernobyl）的致命“污云”可以迁徙，还有因特网建立了一个共时性的世界信息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有了清楚的意识。我们可以列举一个简单的数字。九十年代中叶，全世界每年消耗再生资源的1.5倍。更具体地说，全球只有20%的国家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耗水平，我们每年都在“贪婪地吞噬”我们的储备。世界化是一个事实。世界化不可逆转。某些行为可以逆转，民族主义的退却也有可能，我们看到许多抵抗和忧虑不安的行为，但是，世界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其余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了。经济全球化是一项政策和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回顾历史才能弄清楚我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认同单一思维的。当美国人在二战后作为马歇尔计划的条件对我们欧洲人说：“我们很想帮助你们重建，但如果钢铁工业和武器工业一经重建，你们就象闹着玩儿似的重新开战，那我们可不会提供援助。”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压力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赌注是和平，而不是繁荣。降低关税的考量是针对一连串具体的历史事件：经济危机，衰退，关税的提高，民族主义，战争。正是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有关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关系的思想异军突起。这是不是说无论在何时何地自由贸易都能保证发展，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平衡，保证国家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呢？不能，绝对不能！三十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惊人，但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导致通常所说的香槟酒杯的曲线效应，即极少数人控制着绝大部分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只满足于菲薄的收入。

我们将要管理的是一个世界化的世界，不可逆转的世界化的世界。我们不应该将世界化当成一种负担，而应当看作一个机遇和一种变革的需要。

为了明白今天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应该回顾人类悠久的历史，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的飞速发展。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发展。这就是我所说的差距理论：经济，科学和技术日益发展，而思想体系和制度的演进却缓慢得多。

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演变在其规模和系统性方面可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相

比拟。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洪堡大学的出现与十六至十九世纪现代国家的产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分离、专业化和自我参照运动。就大学而言是科学与宗教的分离；创建科系的专业化倾向；自我参照是指大学自治的要求，并以此作为知识自由生产的条件。就国家而言，出现了君主的财富与公告财产的分离；专业化表现为各专业机构的发展；自我参照则是指赋予主权以绝对的价值。

公共行为和大学的相似性也延伸到关系危机之中：

- 学科与部门的隔离；
- 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合作的关系）困难重重，对思考与行动之间的转换产生抑制作用。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惰性、抗拒变革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它说明了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模式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而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人们还想通过主权国家的政府间关系来管理一个完全相互依赖的世界，通过惟恐失去自治权的单一学科来管理处于同一体系的大学。

2. 科学和大学面临同样的挑战：更新与社会的契约

2-1. 目前的社会契约已经过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科学和大学的确存在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对科学来说，这个契约源自战时开发智力的努力，这一努力在战后转化为和平用途。对大学来说，这个潜在的社会契约包括两个方面：专业知识的建立和传播；大学的自由和独立。今天这个契约已经漏洞百出。

首先，大学出路的性质已经改变：大学自身的繁殖和为国家管理社会培养干部的需求越来越少，相反，为企业培养掌握知识技能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有鉴于此，1) 大学失去了对知识传授的垄断，企业的影响力增大，知识有成为商品的危险；¹⁾ 面对能够直接满足经济短期需求的教育体制，大学退避三舍。

其次，社会对于这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越来越怀疑：总之一句话，社会对大学越来越不信任：契约陈旧的特性使大学逐渐丧失了社会的支持。

再者，大学象国家一样，失去了对鉴定的垄断。人们在我称之为公民鉴定网络的

1

日益壮大中不难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如果大学教员仍然高高在上，他们总有一天也会垮台，就像一个被推翻的领袖的雕像那样被拉倒。

最后，在信息社会，知识的联系与机构之间有形无形的壁垒相抵触。反对知识商品化的斗争不能再简化为公共教育的保卫战。有能力的网络将很快比单独的教学科研中心更有生命力。无论如何，大学的地位将从知识的庙宇转变为知识的协调者，而后者在我看来是更高贵的。

2-2. 新的社会契约的要素

在清楚描绘新的社会契约的轮廓，展示其力量和基础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阶段性的标志已经显露的特征：

- 由于思想体系和制度落后于世界的现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缓慢的、边缘的演变，也不是简单的调整。如同在治理的领域一样，大学需要一场观念上和制度上的革命；

- 面对当今世界的危机，新的体系应该有能力回应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变革；

- 新的体系应该有能力处理知识之间关系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 新的体系将目的和手段恢复原位；在此意义上，大学是重新创造人道主义的地方，而不受工具理性的迷惑，这种工具理性归根结底不过是为那些我们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

- 这个体系应该承认知识的其他来源，并将自己定位为协调者。

为了建立这个新契约，必须重新置身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以外，了解“社会契约”这个已经被废弃的概念为何会卷土重来。在我看来有两个互为补充且不可分隔的原因，它们都与世界化和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有关。

首先是世界化。地球上的各种社会生活在一起并非出于它们的选择，而是由于它们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为了管理共同的未来，它们不能象传统的社会那样求助于一个共同的神或共同的神话——比如说国家统一的神话。因此，管理共同的未来属于契约的范畴。

其次，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人们不得不提出相互间的责任问题和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同样，兴办实业的自由须以承认对社会的责任为条件；大学要求社会提供的支持须以它对解决社会面临的挑战作出贡献为条件。

2-3. 新的社会契约建立在《人类责任宪章》的基础上

在详细讨论大学责任的问题之前——这是契约概念的中心问题，让我们先来明确描述一下契约的伦理基础。这个基础并不为大学所特有，而是支撑全部契约的共同基石。

为了清理这个基石，我们曾在联盟的框架内开展了长期的合作。详细描述这个合作过程会使我们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所以还是让我们直接介绍世界公民大会取得的成果——《人类责任宪章》。这个宪章不是一个颁布强制措施和禁令的道德法规。相反，伦理来源于自由的实践。这是一种选择的伦理，一种表面上看似矛盾的要求之间形成张力的伦理，总之，一种关系的伦理：

-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它要求大学在共同的研究课题中吸收多元化的观点、看法、文化和知识，在知识的统一性和方法的多样性之间保持连续的互动；
-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它首先要求宽容，其次是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结合；
- 存在和实有的关系，它要求大学不要将自己封闭在工具理性的教学当中，始终关注个人及社会的人性化发展；
- 连续性和变革的关系，它要求大学成为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称为“人类境况”的保管者和传播者，不受为变革而变革，为革新而革新的迷惑。相反，要能够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因为今天人类永续的发展要求这种变革；
- 最后是自由和责任的关系。

《人类责任宪章》明确表达了当今世界责任的三个主要特点，你们将看到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大学以及大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契约：

- 责任关系到对我们行动的影响，甚至是难以预见的长远影响；
- 责任与知识和能力相称；这一点特别与作为知识占有者的大学有关；
- 最后，责任在于创造变革的能力，这一变革的能力只能来自创造与其他人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以无能为力为由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以上三个方面的责任如何适用于大学？它们是否有助于建立大学与社会的契约？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2.4 大学本身的责任

大学的首要责任是其长远的影响。这是由我所谓的差距理论决定的。我们的代议

制体系落后于现实。这使得培训机构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管理明天世界的那些代表正是在这些培训机构中产生的！这对教师是巨大的挑战，他们接受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教育。这让我想起一个哲学家对政治家所表达的看法：政治家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就停止了思考。当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体系还停留在他们开始投入政治斗争的时候。由于他们都是职业政治家，而职业生涯要求他们很早就投身政界，而激烈的竞争通常使他们很晚才能达到目的。大体上，在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实质之间相差四十年。对大学来说，差距不是四十年，而是二百年！

大学的责任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这是每个大学教师的责任，每个大学的责任，也是大学教师共同体的责任。我想进一步说明这三个层级。前两个层级可以通过巴西大学教师暨大学责任宪章来体现社会契约。我们这个会议的国际性所象征的第三个层级则与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有关。这是二十一世纪日程表的第一要务：全球化——我们的相互依赖性的国际特征——目前还没有真正对应的国际机构和政治团体。因此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切实有力的世界共同体。我们不能忘记，“人道”问题自二战后才随着“反人类罪”概念的引入而成为一个权利主题；世界共同体的概念是人类学的一次新的飞跃，而大学在其中应承担关键责任。在世界已成为我们内部空间的今天，我们应该记住大学的双重词源：

- 第一个词源是“学生共同体”（*communauté humaine d'étudiants*），后来才扩大为“学生教师共同体”；
- 第二个词源是“全部的”（*universel*）。以往是知识的总和，今天是挑战的总和。

在我看来，大学的责任有两个主要内容：

- 培养未来的教师，那些将塑造青年一代的人。现在的问题不是年轻人适应未来社会的问题——好像历史提前写好了一样，而是年轻人处理各种关系和进行必要变革的能力问题。

- 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地方关系的能力，以一种新的方式共同迎接公共事务的挑战。正是在这里，大学的新角色——知识网络的协调者——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全球化并非使参与者远离本地区，相反使他们回到本土。因为地区在知识的管理中，尤其是在学习处理不同性质的关系方面，是未来治理的基石。作为社会参与者，地区在未来几十年的角色无疑将越来越重要，而企业则不然。

因此，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应该包括若干方面和若干层级。一方面是一个规定大学

教师共同体责任的全球契约，以回应当今世界的巨大挑战和对年轻人的培养；另一方面是阐明大学与社会其他参与者关系的区域契约。

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大学是公民的大学。但是它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培养未来的公民。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进行‘公民义务教育’，而是让每个人做好尽责的准备。

首先是我说的每一代人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年轻人和德国的年轻人的责任是建设欧洲，以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集体自杀。下一代人的责任也很明显，这一次不是建设欧洲，而是建设世界，目的也是避免集体自杀。

其次是培养学生进入世界和创造世界。从前我们说“培养人道精神”，从过去的伟大思想家那里汲取精神养料。今天，我们要培养的正是人道精神。如同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建议的那样，为什么不能试想所有国家的大学，所有专业的一年级都学习同样的课程，例如：

- 选择的伦理和公民资格（从地方到全球）；
- 文化间问题；
- 共同的挑战；
- 知识的联系和国际关系的建立。

例如，为什么不能想象几所大学联合印度、中国和非洲共同组织若干个公民论坛，交流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疑问，并与各方面的专家对质呢？应该如何做？采用什么样的变革战略？谁有能力实施这个战略呢？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回到刚刚说的责任的第三个特点（创造变革的能力）：能力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创造的。或者用保罗·里科（Paul Ricoeur）的话说：“当人们聚集到一起的时候，能力就产生了，当人们分散的时候，能力就消失了”。

对于“谁有能力设计和推动必要的变革”这个问题，唯一的回答是：公民，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本身。

3. 改革大学的联盟战略

3-1. 将庞大组织的变革战略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大学

大学的首要责任是推动它自身的变革。它只有通过建立联盟才有力量和能力做到这一点。什么是联盟？这是一种新的组织方法，不建立新的机构（大学并不缺少机构！），但是确定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道德准则和具体的工作机制。

大机构要想变革必须上下结合——这正是国家改革的困难：上层要有改革的愿望、远见和长期的战略；下层要有变革的深切期盼，个人和集体对意义的追求，革新的能力和冒险精神。例如，我在《心系国家改革》这本书中介绍了法国的所有国家改革是如何流产的，因为在上层缺少一种远见和持久的努力，好像只需改变组织机构图表就能改变其机能，只需换件衣服就能改变一个人。它们之所以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务员和他们的想法、经验、个人对公共行为的意义的探求不是被当作变革的动力，而是被视为阻碍变革，拖后腿和政治权力推动力的抵抗力量。

最近的一个错误是克洛德·阿莱格尔（Claude Allègre）在担任教育部长时犯的。他开始实施他的改革战略时宣布，他将“给毛象抽脂”。就是这句简单的话使他失去了国家教育系统中那些本来赞成他的想法的人的支持。

大企业变革战略的问题并不陌生。事实上，一个无力改革的国家不会消失，而是日趋衰败，在其他参与者的眼中丧失其合法性，并且从内部失去其自身的意义。一个企业，无论它曾经多么强大，如果不知变革，也会陡然崩溃。

从企业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四个规则，四个为成功的变革战略所必须的条件：

- 集体的危机意识，这对论证改革必然造成的阵痛以及对现状的质疑和批评非常必要；
- 对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想法明确一致；
- 分阶段长期改革行动的持续性；
- 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在组织内部建立“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由那些比其他人更有责任心，更有觉悟和更有创新精神的人组成，他们不满足于维持地位和既得利益，勇于超越习惯势力，着眼于未来，并甘当这一集体事业的发动机。

3-2. 确定和建立不同层级的改革联盟

因此，改革不是从代议制机构开始，而是从组织和个人的联盟——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联盟——开始发动，这些组织和个人对社会和未来有相同的责任感。我们知道“代议制机构”的使命是代表一个团体，保持其延续性，或多或少体现一种“永久的秩序”。它们并不因此而成为变革的阻力。它们掌握着合法化的重要权能，因此，它们可以通过发表对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有利的言论，为一个新的大学责任宪章背书而对改革的战略大开方便之门。但是“代议制机构”本身不能成为发动机，必须建立联盟；任何一个机构，出于其本性，都会站在稳定性一边；而一个联盟则会站在发展一边，这就是为什么不应将联盟制度化的原因。

正如社会契约本身一样，二十一世纪大学联盟也应该建立不同层级的组织：

- 世界层级：既然大学在世界层级应该是共同体和普世性的体现；
- 国家层级：在现阶段，最简单的是汇聚改革的政治愿望，既体现社会整体的愿望，也体现大学本身的变革愿望；
- 大学层级：因为正是在这一层级，许多革新的尝试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的变革；同样也是在这一层级，可以建立社会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区域社会契约。

我们这个会议是响应巴西教育部长的倡议召开的，他代表了巴西改革的政治愿望。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改革者和大学校长以及教师，他们是带着躬逢盛会的愿望而来的。请允许我大胆设想，我们这次会议就是建立不同层级联盟的开端。果真如此，那么这次会议将是历史性的。

3-3. 变革战略的机制、参与者和阶段性安排

一个联盟的关键在于工作的具体部署，这些部署旨在沟通和建设：

- 要想将每个人的具体经验转化为整体的战略，并且使这一战略根深蒂固，得到现实土壤的滋润，补养和启迪，就必须具有发挥集体智慧的机制。我们不再需要用来自上面的口号凝聚共识，无论这些口号多么正确。如果我们希望结成联盟，方法就应该与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每个同盟者都应该始终感到自己既是集体战略的策划者，也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

- 同盟者之间应该有联系的方法，集体讨论的空间，联盟集合的地点。互联网和网站彻底改变了联盟建设的条件，尤其是在消息灵通的大学界。

- 应当有创制行动：对大学来说，联盟创制行动应当围绕不同层级的责任宪章展开。围绕经验交流和辩论的共同空间才能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身份。

- 最后，在一个致力于长期变革的联盟中，应该有共同的评估机制，定期回顾走过的道路。还要有具体的阶段性规划，否则，意图最好的战略也会陷于停滞，最热情的改革者也会气馁。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杰（Michel Crozier）针对我们把词语当作事物，把关于变革的讲话当作变革本身的民族倾向指出：“社会变革不能通过法令实现”。变革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个集体进程。

但是，一个这样的联盟如果不包括可能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学生——的话，那将会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为了成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为了孕育和催生这个世界共同体，学生也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联盟，以赋予中世纪大学——学生共同体——以新

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新一代正在寻找意义和参照系。教师不能代他们建立这个联盟，但是很明显，课程的方向，国际交流的组织，后勤支援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结论，我想说，在改革的战略中，人们不是也永远不会从零开始。萌芽已经存在。他们可能是分散的；各自在他们的机构中被边缘化；缺少一个将他们联合起来的一致的前景。但他们是面团的酵母。这些萌芽大量存在于大学的内部。因此，关键是从一开始，当国家或国际的改革愿望一经显露，就对他们伸出援手，充分重视他们的价值，并将他们团结到网络中来。

作者：

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瑞士—法国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执行主席。

La revue Dialogue Transculturel, N°.19, 2006, pp.3-12, Pierre CALAM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